

本刊將陸續全文上網，歡迎海內外讀者就本刊文章撰寫評論文章，在「三邊互動」欄目發表短評的作者，亦可將文字擴展成短論。

——編者

互聯網如何形塑大眾抗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經歷了1980年代短暫的春天後，國家主義的壟斷性經濟模式開始加強。新興私人企業家階層愈發表現出與國家合謀的趨勢。市民社會團體的發展仍然受到國家強有力的控制。與此同時，分稅制改革使得1990年代後地方發展型國家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模式。以後，圍繞都市發展與勞工權益而展開的失地抗爭、勞工抗爭、市民權抗爭，可以視為正當政治渠道依然堵塞的必然反應，同時在地方經濟分權的背景下，這種抗爭模式仍然十分分散化、個體化，很難形成大規模的大眾抗爭運動。加上市民社會組織網絡的匱乏，儘管時常出現極為吸引眼球的抗爭行為，但卻鮮有對制度的影響和推動力。

近年來，以大眾抗爭為主題的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鮮有論及科技因素，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是如何對當代抗爭產生影響的。胡泳的〈中國的互聯網與社會動員〉（《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號）一文，着力於探討論壇、博客、微博等諸多傳統與新型互聯網媒介怎樣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發揮了替代性的中介作用，彌補了市民社會組織動員能力的不足，以一種非傳統的公眾參與模式，形塑了中國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在作者看來，社會生產的空間在當代中國無法從實體社會組織中尋找出路，而只能存在於網絡虛擬空間中。這種論斷在當前諸多具有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中，已經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印證。

盧超 上海

2011.7.2

異域理論的本土化

尹欽、張鳴的〈中國紅色革命中的認同和「政治行動主義」〉（《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號）一文，掙脫意識形態的樊籠，通過大量鮮活的史料，還原了較為真實的歷史圖景，令人深思。縱覽全文，給人最為突出的印象是作者較好地把異域理論本土化。作者研究了麥克亞當（Doug McAdam）等人提出的「鬥爭政治」理論，提出了「政治行動主義」的概念。透過這個新術語，作者對中國革命的認同進行了合乎邏輯的解讀。

在新的理論支撐下，該文新論迭出。如農民參加造反，

按過去的說法，是因為活不下去了。然而，真實的情況是，讓老實巴交的農民投身於造反事業，如果不突破其心理障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又如共產黨進行了較為頻繁的黨內政治鬥爭，卻並沒有削弱其組織作為整體的凝聚力，原因是「鬥爭」本身就是創造個人對黨的認同的一個關鍵機制，最終是對黨的認同徹底消化了個人的人格、情感和個體利益。類似這樣的觀點，頗富有新意。這種借助於西方理論的研究，摒棄了單一的「政策—效果」模式，重建了鮮活的歷史演進過程，凸顯了共產黨遇到的困難、障礙和糾葛，從而避免了將中共革命神話化和簡單化。

夏松濤 湛江

2011.6.23

「網絡知識份子」的短板

新世紀以來，一個基於互聯網的公共輿論空間和在其中發揮「引領」作用的「網絡公共知識份子」蔚然興起。這種帶有很強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色彩的公共空間，對中國社會政治的現代化無疑具有相當正面的意義（或至少

是可能性)，但亦需察覺網絡知識份子公共話語本身的遮蔽性和及其觀念暴力的一面。

陳舒劼的〈網絡知識份子公共話語的反思〉（《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號）所提及的「綠壩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面。透過三組不同的理論框架，作者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公共知識份子的網絡話語，因其自身的身份選擇和其所預設的立場姿態而具有的有限和偏狹。正如「綠壩事件」進程所展示，這種局限性使得公共知識份子的網絡話語在發揮效力的同時，也潛在地阻礙了更為實質的討論和思考。

「網絡知識份子」具有強烈的網絡平民主義的原色，以「常識」之名（樸素善惡觀念和西方現代政治社會理念一般原則的混合）發言，積極而言，往往內在地切合於當下中國社會進程中的民眾對各項尚不完善的公民權利的要求，從而凝聚出某種「公意」；消極而言，則缺乏社會學意義上「超脫」的能力和意願，這一點恰和西方典型意義上的「公共知識份子」形象相背離。耽於姿態和狂歡而錯過更實質、深入思考的網絡知識份子，既不是當下中國社會遭遇的困境的藥方，也不是病灶，而更像是某種症候。「超脫」的知識份子如何與夷平化的網絡做更良性的耦合，是相當嚴峻的思想問題。

范雪 新加坡

2011.6.19

中國的推特政治影響

吳強的〈在場的權利：中國的推特政治〉（《二十一世紀》

2011年6月號），對於理解「推特」對當前中國政治的影響有着獨特貢獻。該文揭示了推特這種新興媒體對於中國政治表達、傳播和動員諸方面的改變。

但就目前來看，推特對於中國政治的影響還有限。一是由於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推特政治的潛力，開始逐步加緊對推特使用的控制。二是儘管使用推特的人數在中國有大幅增長，但其絕對人數還較少，規模效應還沒有發揮出來。使用推特的人群也比較特殊，在議題的設定上偏向性比較強。三是由於「推者」之間具有很高的同質性，推特上的討論容易走向極端化。高同質性也導致很多推特信息都只是在一個小圈子裏轉。四是「推者」之間組織化程度低，只是鬆散的非正式群體，極大地限制了推特政治的利益綜合和政治行動功能。五是由於字數的限制，加上推特信息的易逝性和繁雜性，使推特容易淪為宣洩和咆哮的工具，其政治闡釋和教育功能比較弱。因此，在社會利益格局和意識形態沒有得到根本轉變之前，推特政治的影響力有限。

安衛華 波士頓

2011.6.20

「群體性事件」還是「抗爭政治」

頗富中國特色的概念——「群體性事件」，成為當代中國政治的一個焦點議題。不過，圍繞這個極具「官方」色彩的概念，學界有許多分歧，很大程度地影響了學界和公眾對

「群體性事件」這個概念所反映的、甚至扭曲的某種政治現象的認識。高旺的〈「群體性事件」：抗爭政治學的視角〉（《二十一世紀》2011年6月號）一文將國內學界認識「群體性事件」所依賴的主流理論資源梳理得透徹，並且指向理解「群體性事件」所必需的社會運動理論，於當下討論極有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群體性事件」還是「抗爭政治」，不同的提法反映着學界內部的根本差異：前者站在政府治理的立場，着眼於「維穩」的統治藝術；後者從民主促進的視角，分析抗爭如何可能以及抗爭如何改變政治。不過，如何理解「群體性事件」的政治性，或者說如何界定它們與「抗爭政治」的聯繫，僅僅以政府捲入或者「群體性事件」所針對的公權力來衡量，卻可能因為低估它們的社會運動性質，而忽略這些偶發、分散的抗爭事件背後的網絡關聯的中國特色的社會運動，以及可能是更大範圍的民主運動的社運背景。正是這一深刻的政治背景，才有當局一方面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另一方面又相當弔詭地採取大規模強制手段鎮壓。

同時，如何客觀看待「群體性事件」，還離不開那些從街頭監控器觀看街頭群體性洩憤的一些黨國官員和學者本身，往往是他們定義了人民群體是在「依法維權」，還是「以理維權」。

吳強 北京

2011.7.12